

日澳羊毛貿易與兼松會社早期發展之關係

林志龍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摘要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開始與西方貿易往來。多年來學界對日本的國際貿易有甚多歷史性的研究，日本與澳洲的經貿研究則較為少見。本研究即以十九世紀末期成立的日本兼松會社為例，分析日本與澳洲的早期貿易。本研究發現日本政府將羊毛界定為軍事物資，帶動了商人進口羊毛的動機，但是羊毛進口高度受政治左右，日本在華貿易特權也影響了日澳羊毛貿易的成長。稍後，羊毛貿易有限的利潤促使兼松開發其他初期產品進出口，以及擴大對華貿易。但地產增值與定價策略才是最初二十年該公司所得的主要來源。

關鍵詞：日本、澳洲、總合商社、羊毛貿易、企業史

壹、導論

綜合貿易公司在日本被稱為總合商社，可被廣泛定義為「在全球各地買賣各種商品的公司」（長沢康昭，1990：10-19）。綜合貿易公司在近代出現，因為日本經濟實力受到關注，被當作研究的對象。今日，臺灣、東南亞及中南美洲都有設立現代的綜合貿易公司，其原型可說是來自日本，近代日本綜合貿易公司的成立與活動因此成為企業史，甚至是比較經濟史、區域研究的注意焦點。綜合貿易公司對於日本企業史的重要性，可以從專著與通論的強調看出¹。

明治時代初期，日本政府為了解決日本商人資金不足的問題，並打破當時外國商人對日本貿易的支配，便居中主導，半強制性地組織各地商人成立通商會社與為替（外匯）會社，結果以失敗告終。日本政府成立橫濱正金銀行為外匯指定銀行，開始獎勵出口、防止金銀外流的管制（杉山伸也，1989：173-91）。這時的貿易政策不完全成功，但促成了各地中小產業的組織，強化了本國商人的團結（籠谷直人，1990；姆井義雄，1969：22-30；Maeda, 1990: 92-94）。

此時綜合貿易公司的出現，學界有不同見解：有學者以為，明治初期為了與外國商人競爭，導入技術，建立兼營保險、外匯等多項貿易補助功能的多元商品原料進口的貿易組織乃不可避免，甚至日後成長為財閥（中川敬一郎，1967）。或有以廠商理論強調，綜合貿易公司成立是為了集中資源與節約外部成本（森川英正，1976）。亦有學者以為，綜合貿易公司的形成是為了聯絡國內外的製造、銷售網絡，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綜合貿易公司成立之初便需要任用高學歷人材（米川伸一，1983）。雖然有不同的見解，綜合貿易公司的興起必須從歷史脈絡中考察是無庸置疑的（Yamamura, 1982）。

不可否認的是，明治時代由於當時法律的不完備，以及社會快速的變

¹ 有關綜合貿易公司何以在 19 世紀末期日本興起的討論整理可參考木山実（2009）；直至二次大戰前的發展史最新論述可參考大島久幸（2010），最新導論見田中隆之（2017）。

遷，商業活動具有高度的人治色彩。同時出口商品是有地緣關係的低成本工業產品；進口商品方面，亞太地區進口多為原物料，歐美地方多為高價值產品（橫山源之助，1990：153-54）。其中，由於由上而下的服飾改變，使得羊毛成為日本自 1868 年之後需求大增的進口原料。由於毛料可以用來製作在北方冬季作戰的軍服，一開始日本的羊毛進口便成為關係國防的重要原料，掌握進口甚至於自給自足便是日本政府長期關切的議題，也是商機之所在。本文運用日本 20 世紀最主要的澳洲羊毛進口商兼松會社資料，討論 1900 年以前日澳貿易的實態，以及同時期日本羊毛政策的變遷。這個研究主題在現代缺乏有系統的整理²。兼松早期的利潤來源是否為羊毛貿易也有待進一步考究，本研究希望能彌補這些缺口。

明治時期日本貿易最大的變化就是脫離幕府鎖國體制，因島國發達經濟而展開的商品原料進出口及銷售。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政府主導的國際貿易確實逐步開展，當時的財閥與政治人物確實有所掛勾（許介麟，1977：264-74）。但也不能因此忽略業界的自主性，尤其是常被強調「非政商性」的「關西系纖維商社」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紡織業是日本對外貿易的主力。早期生絲出口由外國商社把持，但日商逐漸發展。1892 年，日本棉花株式會社設立，主導印度棉花進口。此後，紡織專門商社開始在產業中心關西出現，被稱為「關西系綜合貿易公司」。1889 年，兼松房治郎在神戶成立兼松商店，為澳洲進口專門商社之始，也被當作關西系「羊毛進口商社」的代表（梅津和郎，1976：153-54）。

赫斯梅爾（Hirschmeier）和由井常彥（1977：120-23）在討論近代日本的新興商人時，刻意強調趁亂世而起的新富。這和所謂「政商」的不同：前者憑恃自信與才能，在強烈的追求利潤動機驅使下，以市場投機或大膽投資的方式獲得利益；後者則是藉由依附政權，從而得到政策保護支持，

² Nakagawa 與 Rosovsky（1963）是罕有的例外。近來的研究方面，田村均（2004）討論進口毛織品與技術對社會服飾流行的影響。

³ 學界就綜合貿易公司主要貿易商品、總公司所在地的不同，有纖維和鋼鐵、關東與關西等分類法，見辻節雄（2000：5）。本文對「關西」的定義，從作道洋太郎（1981：308）引用的現代通說，即二府五縣：京都府、大阪府、滋賀縣、三重縣、奈良縣、和歌山縣與兵庫縣。

甚至獲取特權來取得利益，本研究會提及的大倉組即是⁴。通說以為「關西商社」獨立自主，並非「政商」，不像大倉或三井等「御用商人」受到日本政府委託支持（作道洋太郎，1973：190-92）。事實上，本文將試圖說明這兩者無法完全區別，在施行指導行政與保護主義的日本，政府政策有絕大的影響力，有著只是特定廠商或整體產業受惠的不同。保護主義對日本商業不可否認的有其正面幫助，但是兼松並沒有直接的政治關係，可說是利用政府政策需要謀取商機的商人，而不是要求政客製造專屬特權牟取利益的政商。詳言之，兼松房治郎趁日本政府對羊毛需求大增而立業，進而開展了日本與澳洲之間的貿易關係。

綜合貿易公司的起源與活動，可以從美國學者建立的理論探析（Wilkins, 1986: 201）。但是，這種演繹式的應用，似乎無法說明綜合貿易公司何以在日本興盛，日本特殊的文化與十九世紀後半期日本的時空背景，勢必加以考察，才能完整地瞭解這個起源自日本的商業組織（橋本寿朗，1998）。同時，綜合貿易公司立足對外貿易，為現代多國籍企業類型之一。因此綜合貿易公司的貿易對象與地區也應一併考察，才得以瞭解活動之全貌。台灣學界對日本對外貿易的研究以對台貿易為主，少數著作針對對華投資作為個案研究，其中略有提及綜合貿易公司的貿易策略（洪聖斐，1998）。神戶大學天野雅敏教授從事兼松商店早期經營的多篇論文已經集結出版（天野雅敏，2010）。遠山嘉博的日澳經濟關係論文集也有專章討論羊毛貿易（遠山嘉博，2009）。不過對近代日本市場興起的研究，因為與中國或歐美貿易比重較大，以及技術移轉來自北半球之故，在研究澳洲對外貿易方面仍有加強的空間。此外，澳洲國際經濟史研究也因為貿易比重的關係，忽略早期東亞市場的興起，或欠缺周密。例如 Barnard(1958) 為澳洲羊毛貿易的經典研究，卻未提及亞洲市場的角色。宇田正（1976）以及 Purcell（1981）為少數討論亞洲的專題研究，但內容及分析均有待補充。這些既有研究有使用大量資料，本文立基於先行學者的成果，還使用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多本「千住製絨所」官史。此外，2000 年神戶大學

⁴ 「政商」一詞由山路愛山（1908）所創用。

經濟經營研究所整理出版的《兼松商店史料》第1卷中有關於1900年之前兼松商店的經營，亦是本論文使用主要史料。此文獻為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重要幹部前田卯之助於1910年代初期所寫，可看出其經營理念與對公司政策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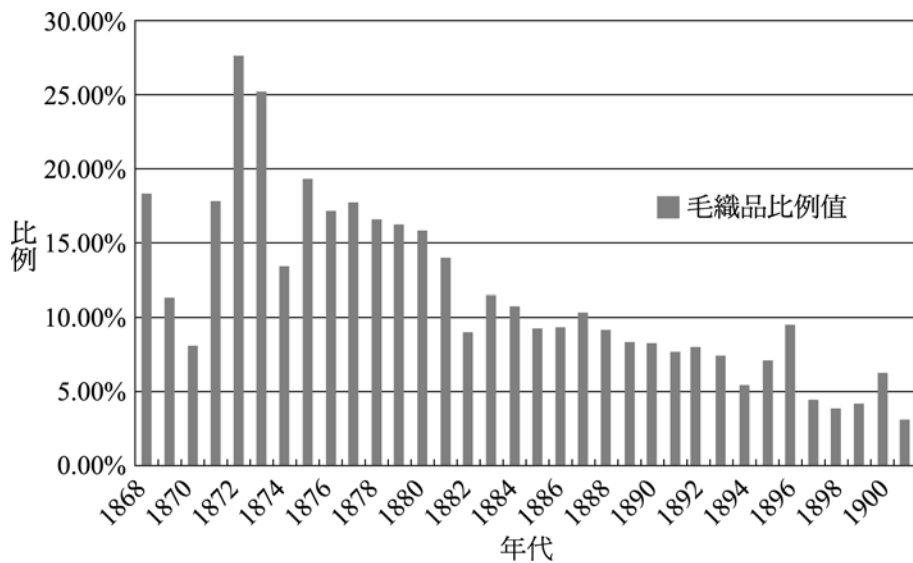
貳、日本政府對羊毛的需求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陸續引進西方制度。產業方面，工部省於1870年成立，開始對軍事交通產業的經營。1873年，甫成立的內務省採行保護獎勵民間輕工業與農業的政策。日本政府並接受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的建議，以國營事業的方式富國強兵。但因虧損不斷，只好自1880年，陸續將軍事與交通以外的各種產業低價脫售予民間特定商人，改以新成立的農商務省管理，這急遽的民營化促成了三菱等財閥的興起。這段國家直接支配產業的時期被稱為「殖產興業」的時代⁵（永井秀夫，1961；原田三喜雄，1972）。毛織商品雖然在幕府時代已經經由荷蘭人傳入日本，但沒有多大發展，1774年飼養綿羊的嘗試亦未成功。當時毛織品是上層武士階級的奢侈品，一般平民不得穿戴，但是毛料製成的裝飾品及囊袋卻日益盛行。1800年代，幕府從荷蘭及中國引進的毛織技術也沒有成功，這項生產革新，連同其他改革，遭到保守人士的抨擊（石田千尋，2004）。

直到1860年代，幕府軍隊才有部份採用西式裝備（津下剛，1943：141-49）。明治維新之後，1870年，陸海軍全面換發西式軍服，次年員警與郵差也改穿西式制服，稍後所有公務員受命改穿西式服裝，西服的風潮在社會上緩慢開始流傳，但至19世紀末，僅以上流社會與公家機關為主

⁵ 有學者以為殖產興業始於1870年工部省的重工業政策，見大石嘉一郎（2005：28）、以及石井寬治（1991：123-36）。或有學者將明治維新以至1880年代末銀本位建立之間的政策統稱為「殖產興業」，見大島清等人（1974）。但考量日本政府對產業的直接管理在1880年代之後僅有軍事與鐵路等交通業，因此筆者以1873到1880年之間，內務省主導，全面介入生產的時代為所謂「殖產興業」時代。這段「殖產興業」簡史可參考田村貞雄（1977）、以及洪聖斐（1998：11-18）；國有產業拋售政策與結果可參考小林正彬（1977）。

(Nakagawa & Rosovsky, 1963: 61-63; Yasuzawa, 1982: 189)。由圖 1 可看出當時進口毛織品金額佔全日本總進口的高比例，在 1880 年代之前，毛織品進口除了 1869 至 1870 年，以及 1874 年之外，進口恆佔全國總進口 15% 以上，1872 和 1873 年更超過 25%。高價的優質毛料對日本的財政是項負擔，廉價毛料又不耐用，自製自銷便成為一項選擇（中原虎男，1927: 191）。當時毛織品需求的大量增加是由政府，尤其是軍方主導而成，而戰爭與軍備擴張又是影響官方對毛織品需求相當重要的考量。由此觀之，毛紡技術是為國家之所需（青木周藏，1970: 30-31）。商機所在吸引外國商人申請設廠，但是遭到大久保利通的否決。大久保希望羊毛生產是國家主導商業政策的一部份（石塚裕道，1973: 160-62）。



來源：數據見附錄 1。

圖 1：毛織品進口金額佔全日本總進口比例

當時的日本並未形成政黨政治，而是由倒幕有功的薩長土肥四個地方藩閥把持朝政，公共政策私相授受為常態。1873 年，大久保利通在法國考察時，當時在英法考察毛紡事業的大倉喜八郎也向其遊說西式軍服的優點，大久保贊同之餘，允諾協助大倉發展毛料事業。由圖 1 所示，1872 年

進口的羊毛金額佔日本總進口的 27.57%，這應是大久保對大倉計畫動心的原因之一。大久保並表示官營工廠若營運良好，將轉交大倉經營（鶴友會，1924：64-67；勝田孫彌，1928：102-106；日本史籍協會，1927-1929：9、19-24）。為了達到原料自給自足，日本政府展開進口替代政策，計畫設立國營養羊牧場。經由木戶孝允及伊藤博文引薦，大久保利通給予長州出生，已在德國的井上省三官費資格。井上 1871 年公費留德學習軍事，兩年之後放棄公費軍事教育資格，自費學習毛紡（市川謙作，1993：10）。政府另外選定薩摩藩的岩山敬義前往美國學習牧羊，井上省三和木戶孝允都是長州出身；岩山為西鄉隆盛妻弟，兩人之雀屏中選與當時的藩閥政治不無關係。

日本當時缺乏相關技術，不得已只好委託外國人協助。1875 年，透過李仙得（C. W. Le Gendre）中介，美國人瓊斯（D. W. Ap Jones）於日本開設牧羊場。根據其企劃書，除支付瓊斯薪資之外，日本政府必須補助相關經營支出，並收購羊群與羊毛。但申請送至主管財政的大隈重信之手，便以官方不願將國營事業交付有治外法權的外國人之手，轉由內務省處理。經過大久保利通的干預，日本政府開設國營牧羊場，聘用瓊斯為主事，除薪資之外，允諾撥付牧場三成純利（net profit）（角山幸洋，1986）。牧場陸續自中國及澳洲等地購入羊隻，日本各地也開始出現民間牧草業。這其實是日本政府重商主義產業的一部份，在大久保利通的計畫下，日本毛織業從原料到製造將可以自給自足，根據他的估計，每年日本政府花費外匯 557,000 圓於進口官府制服用的毛布，日本的毛織業能自給自足對國家收支必有助益。大久保以為，毛織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是初期需要國家扶持的產業，在經營步上軌道後可考慮轉讓民營。日本政府同意大久保的建議，於 1876 和 1877 年共編列 217,524.5 圓，籌設國營製絨所（日本羊毛紡績會，1987：6-7）。

1879 年，「千住製絨所」正式於東京開始營運。與當時其他工業生產不同的是，製絨所一開始就在日本人自己的掌握之中，甫返國的井上省三被交付大權處理廠務（木代修一，1938：82-86）。大倉組同年向怡和洋行購買羊毛十萬斤，機械所需煤炭則由淺野組負責。原料自給自足方面，國

內養羊牧場因氣候等因素並未成功，井上省三曾抱怨製絨所被迫購買劣質的羊毛國產品（政治經濟研究所編，1960：73-73）。第一年，製成品的國內銷路有限，銷售額僅約為產量的 7 分之 1，帳面約損失 19,000 圓，1880 年度開始轉虧為盈，淨利約 22,000 圓（無作者，1953；政治經濟研究所，1960：38）。

1880 年 11 月，日本政府改變政策，除了軍事產業或需大量技能資本的生產事業之外，將紡織等原內務省官營製造業拍賣民營。1881 年，甫設立的農商務省計畫將製絨所撥交民營，談妥售予大倉喜八郎，但是遭到井上省三反對（農商務省工務局，1981：141-42）。井上注意到，當時製絨所的生產除供應軍需之外，幾無民間需求（小林正彬，1981：109）。1880 年 3 月 18 日，新修訂的「陸軍服裝規則」會使得毛布制服的訂單增加，這是製絨所獲利的希望。陸軍將領大山巖也強烈反對，強調絨布必須穩定供給，確保軍服生產，因此千住工廠維持由農商務省經營（政治經濟研究所，1960：50-51；角山幸洋，1983：281；和田憲夫，1982）。

同時，民間經由來自國營工廠以及中國的技術轉移，開始經營民間毛紡產業。民間廠商成長緩慢，10 年內成立不到 10 家，且技術與經營都不佳，官方訂單對民間毛紡業維持非常重要（日本羊毛紡績會，1987：10-11；政治經濟研究所，1960：44）。而且，當時的民間毛織廠基於國內需求不大，加上技術問題，無法加工利用原料剩下的屑毛（waste）。國內工廠常自歐洲進口已經加工的已梳（carded）毛條（top），避免處理屑毛（牛山環，1903）。國營牧場的原料主要供給官方需求（津下剛，1943；東洋經濟新報社，1922：31-34；佐藤幸三郎，1994：54-58）。1882 年，日本政府放棄國內牧羊事業，民間牧羊業也乏善可陳（我妻東策，1936：176-86）。岩山轉任地方官吏，農商務省相關部門裁撤，羊毛原料幾乎完全依賴國外進口。當時日本國內輕工業的發展遠較重工業迅速，毛紡業是日本唯一全盤移植的紡織業，但是毛紡生產並不成功（金谷信之，1993；Smith, 1955: 63-66；中村尚美，1952）。從此日本開始大量自外國進口羊毛。

1883 年，大倉喜八郎依『外國品依託購買通則』，申請依「時價」代理國營工廠自墨爾本進口羊毛，賺取 2% 之手續費（〈千住製絨所沿革誌：

創業-明治 22 年度〉，1925：1888 年 11 月記載）。1888 年，千住工廠轉歸陸軍省管轄，主要負責軍用絨布的生產，大倉組繼續取得代理權（千住製絨所，1928：14）。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將羊毛視作必須穩定供給的戰略資源，在羊毛確定由國外進口之後，對於國際貿易商人來說，這是一個潛在的商機。澳洲是全球最大的羊毛輸出國，也是日本重要的進口管道。1890 年，會計法施行後，『外國品依託購買通則』失效，政府採購應以招標決定，大倉組原先的羊毛合同本應無效。不過根據會計法第 24 條第 4 項規定，「由生產製造場地或生產製造者直接購買的特別使用目的之特種物質」得不經招標而逕行採購（石森憲治，1909：92）。陸軍省同意羊毛適用該條款，開始在倫敦購買羊毛，大倉組繼續為指定進口商（日本國會圖書，1896：4-5、10）。倫敦為時日國際羊毛再輸出中心（Rose, 1919: 1-3）。在原產地購買羊毛需候時交付，唯有倫敦可立即提供現貨（Onions, 1962: 132-33）。

參、兼松會社的經營與澳洲對日貿易

明治初期，日本和澳洲的關係並不密切。1875 年，日本廠商以傳統工藝製品，參加在墨爾本（Melbourne）舉行的萬國博覽會可說是雙方往來之始，日本政府代表在當時已經建議以澳洲作為國內羊毛生產的原料供應地。1879 年，日本政府因日人在澳之司法訴訟為機緣，任命曾在橫濱經商的猶太裔澳洲商人馬克斯（Alexander Marks）為首位駐墨爾本名譽領事。1880 年，日本參加墨爾本萬國博覽會，會後日人並在墨爾本成立「秋田商店」，為日本在澳洲商號之始（成田勝四郎，1971：79）。日本與澳洲之間的交通無疑地因為擴展的商機而變得熱絡，1880 年，東方澳洲輪船公司（Eastern and Australian Steamship Co.）開始澳洲與日本間的航線，太古（John Swire & Sons Co.）的中國航業（China Navigation Co.）隨後加入（Marriner & Hyde, 1967: 94; Trace, 1965: 27）。當時，日本出口至澳洲最重要的商品是有限的稻米，有其他地區與其競爭。日本與澳洲之間最初沒有定期航班，這是因為雙方貿易規模不大，在日本採購澳洲羊毛之前，返

航載貨稀少，加上貨物可以在香港由太古的船隻轉運，日船在性能與數量上難以與英國船隻競爭（日本駐墨爾本名譽領事，1982）。1885 年，馬克斯同時兼任日本駐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昆士蘭（Queensland）等地名譽領事。當時，除三井物產等少數「御用」公司，得到官方特權之外，日本對外貿易仍被外國商人所控制（石井寬治，1997：92-95）。西方商人憑藉不平等條約之特權，與華商的東亞網絡，一同支配日本的國際貿易⁶。對澳洲貿易也不例外：1887 年，馬克斯向外務省報告，在澳洲只有數名日商經營日本雜貨銷售，而澳洲出口至日本的商品銷售則被橫濱及神戶的西方商人所控制（角山栄，1986 25）。

大阪基層武士家庭出身的兼松房治郎，生於 1845 年，二十歲時決定從事商販業，前往橫濱工作磨練，並從美國傳教士習英文。1873 年，房治郎進入三井物產，負責大阪地方業務。經由經手稻米出口，房治郎開始注意澳洲市場，尤其是出口佔世界第一的羊毛。房治郎最後的目標是自立門戶，因此在 1881 年，三十六歲時便離開三井，參與大阪商船會社的成立。1884 年 5 月，大阪商船會社開始營業，房治郎擔任運輸部門主管。但是不到兩年，1886 年 2 月，房治郎辭職，開始參與地方媒體「大阪日報」經營，從此開始以媒體表達自身意見。1887 年，房治郎前往澳洲雪梨，考察出口稻米至澳洲（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5-6）。同時並利用「大阪日報」發表視察心得，以求影響輿論對日澳貿易之觀感（天野雅敏，2007）。雪梨之行讓房治郎確定自澳洲進口羊毛的可行性（Purcell, 1981: 115）。

以兩地當時對外貿易來看，日澳貿易量實微不足道⁷。1874 年澳洲羊毛首度銷日，但 19 世紀歷年運往日本的羊毛佔澳洲羊毛外銷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兼松商店，1943：539；Ville, 2005: 80）。1889 年 6 月，兼松房治郎返日，積極尋求金主投資對澳羊毛貿易（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9-10）。但是當時景氣開始轉壞，加上預期對澳貿易頗有風險，周

⁶ 不平等條約的內容與交涉談判見鵜飼政志（1999），外商網絡見許紫芬（1999）、以及籠谷直人（1990）。

⁷ 19 世紀後半日本國際貿易概觀見山本有造、奧和義（1989）。

遭友人多躊躇不前⁸。1889年，房治郎轉讓報社所有權，為開設對澳貿易公司準備。房治郎得到住友家的大老廣瀨宰平支持，得到住友出資計一萬圓⁹。先前工作的三井長官個人出資五千圓；與其他友人出資合計借得兩萬七千五百圓（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1-12）。根據出資協定，以五年為期，房治郎成立「兼松商店」從事日澳貿易¹⁰。由房治郎處理店務並負無限責任，按比例支付股東年利6%。若有盈餘，其中五成按出資比例分配，三成為備用款，剩下二成為獎金（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3-18）。加上自有資金合計三萬五千圓，於八月十五日在神戶開設「日濠貿易兼松房治郎商店」，這樣的公司組織，和當時許多草創的企業一樣，法人性質不無問題，實際上近似於西方的合夥公司。或以日本法制名詞來說，那是一種「合資會社」（福島正夫，1988：30-31；宮本又郎，1989）。兼松商店次年隨即在雪梨成立分店，當時澳洲對黃種民族有極為嚴重的負面印象，早期日本移民不乏偷渡從事賤業者（Sissons, 1977; Tweedie, 1994: 22-34；入江寅次，1936：386-419）。日本商人在當地的生意往來自是困難，兼松的雪梨分店在當時成為日本人在澳洲最重要的組織，甚至可說是非正式的領事館（藤村聰，2008：68）。

1870至1890年代西方產業飽受通貨緊縮所苦，澳洲羊毛價格長期低落（Pickstone & Meredith, 1992: 49）。1890年，日本發生明治維新以來首次景氣蕭條¹¹。銀價暴漲，使得日本對美貿易呈現入超。羊毛進口方面，當時供給國營工廠的貨源被大倉喜八郎等人壟斷，兼松商店因地緣關係收到大阪地方民營工廠的訂單。1890年澳洲羊毛的平均出口價為1磅10.75便士（pence），1890年澳洲羊毛之倫敦價格（gross price）為1磅9.07便士，兼松以1磅18便士的高價在雪梨收購羊毛187俵（bales）送往日本

⁸ 1889下半年的金融市場問題見大島清（1952：53-59）；高村直助（1996：127）。

⁹ 1870年代至1894年，廣瀨一人對住友的經營方針有極大影響力，見畠山秀樹（1996：158-64）。

¹⁰ 當時日本的公司常有成立年限的協定，到期時將再商議是否延續（Chakepaichayon, 1981：108-109）。

¹¹ 早期研究以為資本不足引起景氣蕭條，見大島清（1952）、長岡新吉（1971）。高村直助（1976）強調紡織業擴張與資本不足同時造成的影響。

(Pickstone, & Meredith, 1992: 335;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36-37; Barnard, 1958: 228), 當時的 1 俵約折合 60 公斤。

可以想見在缺乏地方知識的情形下, 兼松所付的保險費及手續費可能偏高。當時日本的羊毛紡織設備仍嫌簡陋, 而且當時日本商社之國際信用度不高, 兼松時時為資金調度所苦, 不得不以借款來度過難關, 以創業第一年的資產負債對照表來看, 18% 來自借貸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27)。當時日本輸澳商品以竹器、漆器等雜貨居多, 兼松亦受波及, 年度虧損約七千圓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39)。

小股東見公司虧損, 紛紛要求拆夥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34-35)。細究其因, 除了銀價波動影響, 兼松商社輸出商品僅九千圓, 輸入商品三萬七千圓。日本與澳洲當時的定期交通必須依賴英商太古 (China Navigation Co.) 自香港航向雪梨的航班轉運, 一年運費近三千圓, 輸入稅也需一千四百圓, 環境確實不利。兼松房治郎決定重組公司, 接受出資人退股, 兼松商店不再是合資公司。兼松房治郎改以向僅存的四位出資者貸款, 成立個人企業。房治郎每年需支付 6% 貸款利息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43-48)。當時適逢日本政府公布公司法, 7 人以上出資可成立股份公司 (三和良一, 1968)。房治郎的公司改組也可說是不願公開募集資金, 也迴避經營公開等比較嚴格的規定 (福島正夫, 1988: 249-62; 高村直助, 1996: 172-76)。這種情形在當時的小規模製造業、雜貨批發運輸產業相當常見 (作道洋太郎等, 1980: 129)。

1891 年兼松並沒有得到大阪的羊毛訂單, 只有些許來自「東京製絨株式會社」的需求, 往後到 1894 年之前, 事實上兼松的羊毛訂單不多 (天野雅敏, 2001: 23)。但兼松商店成功地開發新進口商品: 皮革 (hide)、牛脂 (tallow)、牛骨、牛筋、牛黃等雜貨在澳售價低廉, 在日卻有大量需求, 鉛也開始成為重要進口商品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58-59)。兼松進一步開始與外商競爭, 出口稻米至澳洲 (Purchell, 1981: 116)。因此第二年有九千圓盈餘, 其中牛脂等雜貨超越羊毛, 為最重要輸入商品 (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 2005: 65-67)。這時候兼松商店自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獲利的商品, 1893 年, 澳洲發展出以魚油為原料的肥皂製法 (成

田勝四郎，1971：252）。魚油成為兼松採購的輸澳商品之一。但兼松的業務仍不穩定，明治 25 年（1892）的進口收益大幅衰退，導致有千圓左右的赤字（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65-67）。次年（1893）適逢澳洲經濟大蕭條，兼松在澳資金調度歷經波折（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83-84）。但因牛黃等雜貨高利潤，年終除填補去年虧損外，進口商品小有盈餘數百圓，與出口商品利潤合計近四千圓（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89-90）。

17 世紀後期開始，日本商家有將年度三分之一淨利犒賞員工的「三分主義」（三ツ割）商業慣習。明治時代的關西企業尤其普及，但分配比例各有不同（澤野雅彥，1981）。除了依照日本商業習俗之外，5 成利益給予員工分紅（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04-105）。兼松房治郎決定擴大經營，公司增資一萬圓，加上另 5 成利益為備用款二千圓，公司計增資一萬兩千圓（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93-94）。初期的兼松商店除了進出口貿易之外，因為日本在澳洲商業組織的缺乏，也兼營多項業務。橫濱正金銀行在 1915 年才在澳洲設立分行，在此之前，兼松的雪梨分店無疑地從事日澳之間兌換等金融業務。此外，只要有利可圖，兼松商店處處投標，想要擴大其進口商品在日的市場（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76-77）。也自行開設手巾工廠供外銷。肥皂工廠於 1894 年脫手；手巾工廠則於 1900 年結束營業（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73、86、265）。1896 年後趁戰後神戶土地投機風潮，投資不動產，結果影響公司資金調度（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30-32）。但稍後拜地價上漲所賜，公司資產大增（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63-64；村田誠治，1898：109）。兼松甚至代理人壽保險公司業務（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09）。

日本於甲午戰爭之後簽訂的馬關條約獲得在華龐大利權，清廷支付的鉅額賠償金也奠定日本經濟發展的基礎（許介麟，1987）。同時，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外交關係日益改善，逐漸收回關稅自主等利權，得以加強對外競爭力（Nish, 1975）。毛織原料及製成品進口關稅隨之調整，1896 年，房治郎與其他業者向日本政府遊說，廢除自 1866 年徵收的 2% 羊毛進口從價

稅（梅浦健吉，1935：38-39；永田正臣，1967：296-97）。1897 年新頒布關稅稅率，日本政府更進一步地從 1899 年起調高毛織品進口稅，毛織產業政策從原料保護主義轉向生產保護主義，也承認日本毛織原料必須全面仰賴進口的事實。兼松並參與神戶「日本毛織會社」的成立（杉山和雄，1973：74-75）。由於毛織品進口關稅開始調漲，羊毛進口便較具優勢。1899 年，日本政府進一步調漲毛織品進口稅，帶動國內羊毛需求（梅浦健吉，1935：40）。日本國內的羊毛需求由於甲午戰爭之後的軍備擴張而增加，除了大倉組之外，「福嶋合名會社」在 1898 年開始在雪梨為日本政府採購羊毛（〈千住製絨所第二要覽〉，1908：5-6）。官方訂單中，部份為兼松中介進口，收取原價 3% 之手續費，但實際上委託兼松之羊毛進口為數不多（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75-76）。

1896 年日本政府頒布「航海獎勵法」，日本郵船每年接受政府補助，才在 1897 年開設澳洲定期航線，但仍然無法解決返程載貨問題，因此縮短航程。原先日本政府規劃南澳（South Australia）首府阿德萊德（Adelaide）為終點，日本郵船被迫在墨爾本折返以節省成本（日本經營史研究所編，1988：468；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貨物課，1932：267）。澳洲大宗農產品出口多半以不定期散裝船海運，但是羊毛一直使用定期航線船隻運送（Trace, 1981: 5;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貨物課，1932：301）。為了爭取載貨，日本郵船給予返航貨主折扣（rebates），兼松一年運送羊毛超過 20 萬磅，折扣可達 10%，得以減少開支（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271）。拜政府補助與折扣制度之所賜，日本郵船開始威脅英國航商的收益，太古所屬中國航業與東方澳洲輪船與日本郵船談判，日本郵船同意加入運費協定（Marriner & Hyde, 1967: 94）。在澳洲開始限制有色人種移民的情形下，可以想見日本郵船的往澳洲客運受到影響，這也許是日本郵船迅速妥協的原因。

1887 年，「東京人造肥料株式會社」成立，為日本人造肥料商業製造濫觴（津下剛，1943）。日本的人造肥料工業初期在官方主導下，發展並不順利，神戶一直是進口肥料集散地（村田誠治，1898：56-57）。中日甲午戰爭使得原先自中國進口的大豆粕停止進口，日本便自其他地區進口肥

料（〈肥料工業の発達〉，1950年3月24日）。兼松在1896年開始自澳洲進口肉骨粉肥料，給兼松帶來新利基（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36-37）。1900年開始進口的澳洲小麥也是多年的暢銷商品（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274-75）。但不是每一種新開拓的商品都獲利，1896年開始的絲業出口，除了1899年度之外，都招致鉅額虧損，結果在1901年結束（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38-39、284-85、292-93）。1899年嘗試出口煙草至澳洲也未成功，1902年後未再嘗試（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231）。砂糖、肉類罐頭、乳牛及骨碳（bone charcoal）也同樣的是短命商品（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232-33、272-73、278）。此時兼松會社的盈餘是建立在進口澳洲商品在日銷售，而不是日本商品的出口，這可以從雪梨分店長年的虧損得知（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97-204、215-17、243、283、324-25）。

甲午戰爭後，日本取得對中國貿易特權等最惠國待遇，兼松會社也開始計畫在華開展貿易（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188）。不過1900年開張的「兼松洋行」上海分店從事雜貨進出口，結果虧損累累，兩年後即結束營業（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253-54）。華中進出口貿易成就有限，兼松房治郎想趁庚子拳亂，在華北擴張版圖。1901年，牛莊當地官商開始與兼松洋行合作經營進出口貿易，當時兼松進口華北農產品，庚子拳亂時出口製造軍火的原料如硫酸等，而後出口綿織品。

火柴工業所需資本低，成為大阪、神戶地區中小企業自1880年代後主要工業生產之一，也是日本最早在東亞市場以低價擊敗西方產品的外銷商品之一（武知京三，1974：290-346；松本貴典，2004：338-39）。此方面除了在中國日益擴大的火柴市場之外，兼松獲利還是有限（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255-56、322）。

絲業的嚴重虧損使得兼松房治郎在1901年裁撤該部門，同年的景氣蕭條使得往來商家無法按期支付貨款。對華貿易赤字和絲業虧損，加上往來銀行的催收帳款使兼松會社週轉不靈。透過人情關說，正金銀行神戶分行以公開帳目、謹慎經營而不從事投機買賣、人事改革和節約經費為協助條件，兼松會社以不動產擔保獲得貸款才得以渡過難關（神戶大學經濟經營

研究所，2005：294-305）。趁此兼松會社施行裁員，中止在上海貿易業務（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308-309, 317-18）。同時關閉雪梨的店面（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315-16）。在動用備款（reserve）後，仍然無法彌補赤字，兼松房治郎只好在 20 世紀的第一年將公司資本減半以消除虧損（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328-29）。公司的財務若經嚴格估算，恐仍有負債（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330-31）。

肆、結論

進出口貿易與製造業相比較，有較低的進入門檻，並不需要高額的設備投資。但在日本，商品的銷售常被批發、倉儲等因素控制。沒有和相關業者建立關係，根本無法和長期經營特定經濟商品銷售的商人競爭：房治郎早年在航運業工作，在物流業有人脈。也因為早年從事稻米出口，得以掌握這項出口商品的供應來源。但是，房治郎起初在地方商界並沒有影響力，這可從 19 世紀末神戶商業會議所的會員組成看出¹²。也許因為如此，房治郎選擇進口羊毛這個新興商品，來避免和既有進口商人直接競爭。因為低工資因素，當時的日本的雜貨產品擁有國際競爭力（黃完晟，1990：56）。雜貨為小型企業生產，是日本在 1880 年代施行工業化以來，最重要的出口產品，阪神地區則是日本雜貨工業的重心（村上勝彥，2000：18-21；角山幸洋，1992：133-35）。除了絲織等小型手工業，神戶是當時全日本最大的火柴生產區（上川芳美，2005）。火柴在明治中期之後，成為日本的出口主力之一。從兼松的對澳出口項目，也可看出除了傳統紡織業之外，雜貨業出口的興起。兼松在雜貨出口方面，是同時期典型的日本國際貿易公司，而公司所在地點則讓兼松得以掌握阪神在地的產品供給。除此之外，兼松事實上在定價創造兩地價差，進而在帳面上產生利潤。兼松的出口商品在雪梨的售價較神戶的庫存價格為高；同樣地，進口商品在神戶的售價較雪梨的庫存價高（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2005：87）。這中間的

¹² 1890 年之前的神戶商會活動及成員概敘，見桂芳男（1989：3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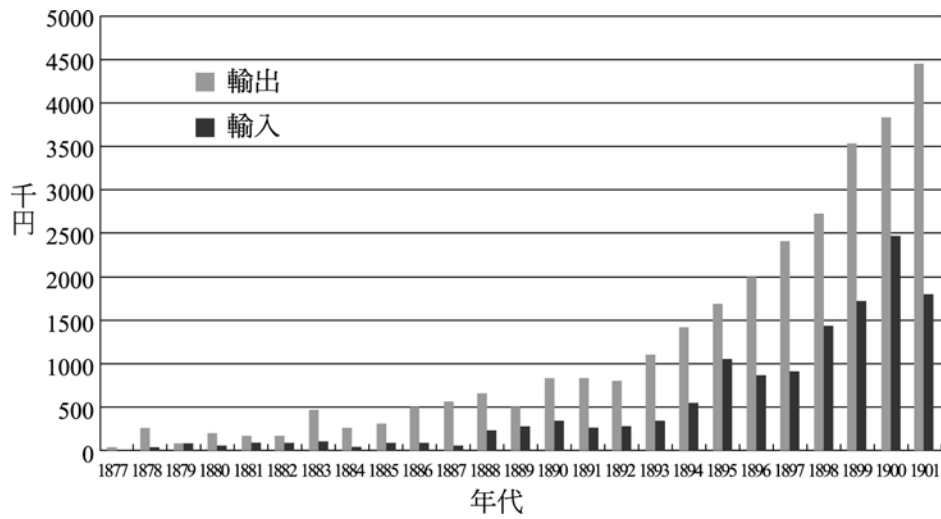
價差便是所謂的未實現收入（unrealised revenues）。但是日本對澳出口始終擴展有限，使得兼松稍後轉往中國從事多角化經營，不過也不算成功。

對綜合貿易會社來說，市場通路與貨品來源的確保是一樣重要的，如此一來，與相關製造業的合作關係重大（山崎広明，1987：191-92）。但是兼松經營初期的羊毛訂單極不穩定，除了無法掌握官方訂單之外，前文已說明，為了避免浪費羊毛原料加工時產生的屑毛，民間寧可進口半成品毛絲品，即使是千住製絨所也在開工後第二年就因為產品品質不理想，就此放棄加工生產屑毛（角山幸洋，1983：280-81）。這使得兼松銷售的未分離的原料需求降低（牛山環，1903）。19世紀的最後20年，日澳貿易佔澳洲對外貿易極為有限但是穩定成長。日本出口成長5倍以上，澳洲出口更超過10倍¹³。不過由圖2進一步得知，以澳洲為主的歷年大洋洲出口至日本的商品總值波動甚大，19世紀末日本對大洋洲出口商品以原物料和手工製品為主，歷年價值倒是穩定成長。甲午戰爭使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受到影響，日本國內的製絨業卻接到大批政府訂單，大洋洲出口至日本商品價值有顯著上升（梅浦健吉，1935：37-38）。由圖3也可以看出1895年前後日本自澳洲進口羊毛總值佔進口總值7成以上。到了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毛織品需求擴張，1899年毛織品關稅調漲進一步帶動羊毛進口需求，日本在馬關條約取得的在華最惠國待遇使在華商務大增，此時自中國進口羊毛開始增加，澳洲進口數量下降，計自華進口羊毛佔全日本進口總值的4成，這或許是促成兼松擴張在華貿易的原因之一，不過羊毛一直不是兼松在華貿易的主要商品，這應該與當時羊毛主要需求來自官方，而兼松與政府關係始終有限有關。

從附錄三和附錄四的損益表可以瞭解羊毛一直是兼松進口商品之一，但是佔公司總進口比例卻高低不定。皮革、油脂等雜貨也是穩定的收入來源，羊毛之外的大筆盈收有1898年的肥料進口、1899年的絲織部門的短暫成長。另外1895、1896及1897年早年營收的15%以上來自預收款項，這意味實際交易的短少，這也是公司利息負擔最重的時候。1901年，庚子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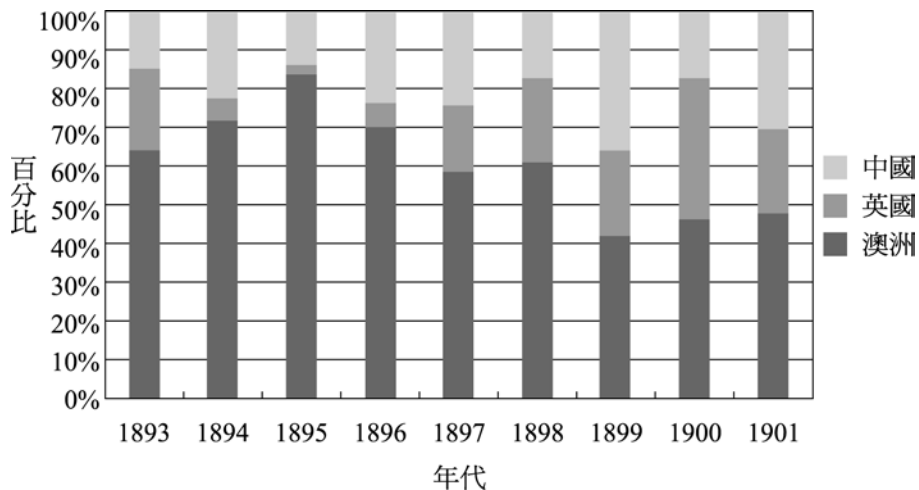
¹³ Pinkstone 與 Meredith (1992: 338) 之數字換算而得。

亂後兼松在華貿易小有增加，但是澳洲貿易大幅下滑，此時收益有四成五大概來自地產增值。兼松創立初期以進口羊毛為志願，日後也確實以羊毛商品聞名，但成長過程的利基頗值玩味。



來源：數據見附錄 2。

圖 2：日本輸出大洋洲 (Oceania) 及大洋州輸入至日商品價值



來源：《明治大正國勢總覽》(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27)，頁 479。

圖 3：日本主要羊毛進口地區佔日本羊毛總進口總價比例

通說認為日本政府駐外領事館在搜集商業情報方面，幫助日本公司海外貿易甚多。但在 19 世紀的兼松業務，在澳洲主要在雪梨，外務省在當地至 1897 年才設館，兼松在地方的商情搜集可說是自行達成。目前沒有資料證實兼松此時與外務省有關聯。而在當時，對澳洲貿易，日本政府的支援是對日本郵船的補助，並沒有其他直接支持。這可看出當時日本政府對澳洲的觀點，明治時代典章制度是效法西歐及美國，其對澳洲的觀點可說是置其於邊緣的角色。日澳雙方關係雖小，確實逐步加強。1899 年日本對澳貿易有三分之二在神戶，而兼松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村田誠治，1898：51）。國家政策帶動了毛織品的需求，國內牧羊業的失敗導致對進口羊毛原料的依賴，兼松商店因此而生，不過這種商機在當時被大倉組等御用商人壟斷，兼松進口的羊毛對公司營收有所貢獻但佔全國比例甚低，兼松也被迫多元化經營，日本因為軍事勝利在中國創造的利多局勢又吸引像兼松這樣的綜合貿易公司前往一探究竟。日本政府自 19 世紀末陸續建構有利貿易擴張的環境，但除了政商勾結的少數財閥之外，其他商人仍舊必須各自摸索來追求利潤。而兼松原先預估日本對澳洲的羊毛需求，如圖 3 所示，以進口總價來說，在 1895 年的高峰之後便下降至 20 世紀之交的佔外國進口 4 成左右的業務，或許市場多變這才是日澳早期貿易不振最根本的原因。

附錄 1：全日本歷年毛織品進口金額佔總進口比例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毛織品比例值	18.22%	11.33%	8.00%	17.73%	27.57%	25.12%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毛織品比例值	13.34%	19.27%	17.09%	17.67%	16.51%	16.14%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毛織品比例值	15.82%	13.95%	8.94%	11.43%	10.72%	9.2%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毛織品比例值	9.3%	10.25%	9.15%	8.26%	8.23%	7.65%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毛織品比例值	7.95%	7.34%	5.34%	7.05%	9.41%	4.39%
	1898	1899	1900	1901		
毛織品比例值	3.83%	4.12%	6.21%	3.07%		

來源：《日本貿易精覽》(1935 : 232-33)、名古屋高等商業學校產業調查室 (1937)。

附錄 2：日本輸出大洋洲及大洋州輸入至日商品價值

(單位：千円)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輸出	26	255	80	180	149	163	448	246	300
輸入	-	23	79	38	71	74	91	26	72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輸出	495	546	646	499	820	824	794	1088	1412
輸入	80	32	221	272	335	255	273	323	541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輸出	1675	1971	2399	2713	3522	3826	4436		
輸入	1034	845	898	1427	1714	2461	1785		

來源：日本銀行統計局 (1966 : 294-95)。

附錄 3：兼松收益 1895-1899

(單位：円、%)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進口羊毛	9,384(25.3)	6,911(17.1)	6,577(13.6)	3,900(7.9)	12,157(13.6)
進口膠原	2,635(7.1)	237(0.6)	671(1.4)		24(-)
進口牛骨	1,380(3.7)	1,288(3.2)	2,961(6.1)	3,788(7.7)	3,778(4.2)
進口牛筋	998(2.7)	1,075(2.7)	439(0.9)	1,021(2.1)	5,989(6.7)
進口牛蹄	916(2.5)	2,928(7.2)	2,825(5.8)		913(1.0)
進口皮革	911(2.4)	106(0.3)	40(0.1)	1,381(2.8)	
進口牛脂	506(1.4)	1,677(4.1)	2,244(4.6)	4,275(8.7)	1,687(1.9)
進口肥料			7,604(15.7)	15,928(32.4)	11,410(12.8)
進口蓖麻子油				752(1.5)	3,325(3.7)
進口砂糖					7,982(9.0)
絲織部		477(1.2)	2,234(4.6)	3,787(7.7)	31,679(35.5)
保險部		244(0.6)	210(0.4)	303(0.6)	368(0.4)
運費折扣		669(1.6)	2,712(5.6)	3,974(8.1)	3,220(3.6)
分店利息	5,813(15.7)	5,971(14.8)	3,475(7.2)		
出口手續費	4,059(10.9)	5,967(14.8)	7,470(15.4)	5,186(10.5)	3,144(3.5)
出口預收	7,760(20.9)	11,045(27.3)	7,881(16.2)	2,018(4.1)	426(0.5)
倉儲房租租金		639(1.6)	323(0.7)	1,783(3.6)	2,004(2.3)
其他	2,758(7.4)	1,182(2.9)	838(1.7)	1,114(2.3)	1,127(1.3)
合計收入	37,120(100.0)	40,416(100.0)	48,504(100.0)	49,210(100.0)	89,233(100.0)
年度盈收	22,330	17,046	22,310	14,240	56,606

來源：天野雅敏 (2004: 62)。

附錄 4：兼松收益表 1900-1901

(單位：円、%)

	1900	1901
澳洲進口收益	60,357(82.3)	28,066(33.1)
羊毛	11,145(15.2)	612(0.7)
肥料	8,646(11.8)	3,666(4.3)
蓖麻子油	8,045(11.0)	9,519(11.2)
食品原料	6,108(8.3)	
小麥	5,048(6.9)	2,809(3.3)
牛筋	4,824(6.6)	1,680(2.0)
牛羊脂	4,690(6.4)	1,496(1.8)
骨碳	4,234(5.8)	196(0.2)
牛骨	4,075(5.5)	2,426(2.9)
膠原料	1,713(2.3)	5,024(5.9)
砂糖	1,231(1.7)	
牛蹄	598(0.8)	418(0.5)
其他		220(0.3)
自華進口收益	819(1.1)	6,848(8.1)
豆粕		4,933(5.8)
其他	819(1.1)	1,915(2.3)
自澳出口收益	-	-
自華出口收益		6,112(7.2)
綿		3,322(3.9)
冰糖		1,111(1.3)
其他		1,679(2.0)
在華部門雜損益	2,509(3.4)	
出口部門雜損益	807(1.1)	
保險部門雜損益	249(0.3)	
出口商品手續費	2,476(3.4)	1,567(1.9)
運費折扣	4,360(6.0)	
國內販賣收益	671(0.9)	708(0.8)
羊毛	621(0.8)	
其他	50(0.1)	708(0.8)
公債及有價證券		
地產		38,692(45.6)
倉租房租		1,045(1.2)
其他	1,109(1.5)	1,758(2.1)
合計	73,357(100.0)	84,796(100.0)

來源：天野雅敏 (2004 : 65)。

參考文獻

- 黃完晟，1990。〈産業革命期における中小工業製品の輸出：大阪の硝子製品の輸出を中心に〉《社會經濟史學》55卷6號，頁768-96。
- 《日本貿易精覽》1935。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明治大正國勢總覽》，1927。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伊東光太郎，1957。《日本羊毛工業論》。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宇田正，1976。〈日本・オーストラリア両国間羊毛取引關係の形成と展開：1930年代中期までの粗描〉《オーストラリア研究紀要》2號，頁142-69。
- 鶴飼政志，1999。〈幕末維新期條約改正史再考〉《歴史評論》589號，頁30-43。
- 永井秀夫，1961。〈殖産興業政策論－官營事業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0號，頁129-58。
- 永田正臣，1967。《明治期經濟団体の研究：日本資本主義の確立と商業會議所》。東京：日刊労働通信社。
- 遠山嘉博，2009。《日豪經濟關係の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
- 我妻東策，1936。《明治前期農政史の諸問題》。東京：壬生書院。
- 角山栄，1981。〈日豪通商史の開幕－メルボルン博（1875年）とシドニ-博（1879年）について〉《經濟理論》182號，頁1-25。
- 角山栄，1982。〈明治13年のメルボルン万国博とアレキサンダ-・マ-クス名誉領事－日豪通商史の原点を追って〉《經濟理論》183號，頁1-19。
- 角山栄（編），1986。《日本領事報告の研究》。東京：同文館。
- 角山幸洋，1983。〈羊毛の技術〉收於永原慶二（編）《紡織》頁268-83。東京：日本評論社。
- 角山幸洋，1986。〈御雇外国人アップジョンズ--下総牧羊場における緬羊飼育〉《関西大学經濟論集》36卷2-4號，頁793-826。
- 角山幸洋，1992。《堺緞通》。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
- 吉田準三，1998。《日本の会社制度發達史の研究》。竜ヶ崎：流通經濟大学出版会。
- 宮本又郎，1989。〈産業化と会社制度の發展〉收於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編）《日本經濟史（4）：産業化の時代（上）》頁351-401。東京：岩波書店。
- 牛山環，1903。〈本邦モスリン業の發達〉《東洋經濟新報》290號（12月25日）。
- 許介鱗，1977。《日本政治論》。台北：聯經出版社。

- 許介鱗，1987。《近代日本論》。台北：故鄉出版社。
- 許紫芬，1999。〈1880 年代東北亞地區華商的貿易活動〉收於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上冊》頁 171-99。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橋本寿朗，1998。〈総合商社発生論の再検討：革新的適応としての総合商社はいかにして生まれいでたか〉《社會科學研究》50 卷 1 號，頁 141-69。
- 金谷信之，1993。《日本近代産業小史》。京都：啓文社。
- 桂芳男，1989。《幻の総合商社鈴木商店：創造的經營者の栄光と挫折》。東京：社会思想社。
- 兼松株式会社社史編纂室（編），1990。《KG-100：兼松株式会社創業 100 周年記念誌》。東京：兼松。
- 兼松商店，1943。《濠洲》。東京：國際日本協會。
- 原田三喜雄，1972。《日本の近代化と經濟政策：明治工業化政策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洪聖斐，1998。《孫文與三井財閥》。台北：文英堂。
- 高村直助，1976。〈明治 23 年恐慌の性格—長岡新吉著「明治恐慌史序説」によせて〉《日本歴史》332 號，頁 80-98。
- 高村直助，1996。《会社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
- 佐藤幸三郎，1994。〈毛織物〉有沢広巳（監修）《日本産業史》（1）頁 54-58。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 作道洋太郎，1973。〈日本の近代化と関西系纖維商社の成立〉《大阪大学經濟学》23 卷 2-3 號，頁 181-92。
- 作道洋太郎，1981。〈関西系企業家の系譜と特質〉《大阪大学經濟学》31 卷 2-3 號，頁 308-28。
- 作道洋太郎等，1980。《日本經營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 三和良一，1968。〈商法制定と東京商業會議所〉收於大塚久雄等（編）《資本主義の形成と發展：山口和雄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頁 149-62。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山崎広明，1987。〈日本商社史の論理〉《社會科學研究》39 卷 4 號，頁 149-97。
- 山本有造、奥和義，1989。〈貿易〉收於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編）《日本經濟史（5）：産業化の時代（下）》頁 85-131。東京：岩波書店。
- 山路愛山，1990。《現代金権史》。東京：社会思想社。
- 市川謙作，1993。《赤レンガ塀にドラマあり：井上省三と千住製絨所》。東京：市川謙作。

- 勝田孫彌，1928。《甲東逸話》。東京：富山房。
- 小林正彬，1977。《日本の工業化と官業払下げ：政府と企業》。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小林正彬，1981。〈千住製絨所の払下げ問題〉收於土屋守章、森川英正（編）《企業者活動の史的研究：中川敬一郎先生還曆記念》頁 103-22。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 松本貴典，2004。《生産と流通の近代像：100年前の日本》。東京：日本評論社。
- 上川芳実，2005。〈明治期神戸市の企業家層〉收於安岡重明（編）《近代日本の企業者と経営組織》，頁 105-42。東京：同文館。
- 森川英正，1976。〈総合商社の成立と論理〉收於宮本又次、梅井義雄、三島康雄（編）《総合商社の経営史》頁 43-78。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神戸大学經濟経営研究所（編），2005。《兼松商店史料》（卷 1）。神戸：神戸大学經濟経営研究所。
- 杉山伸也，1989。〈國際環境と外国貿易〉收於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日本經濟史（3）：開港と維新》頁 173-221。東京：岩波書店。
- 杉山和雄，1973。〈明治期毛織物会社の發展と設備金融—東京モスリン紡織，日本毛織会社のばあい-1〉《成蹊大學經濟学部論集》4 卷 1 號，頁 59-85。
- 成田勝四郎，1971。《日豪通商外交史》。東京：新評論。
- 政治經濟研究所（編），1960。《日本羊毛工業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青木周蔵（坂根義久校注），1970。《青木周蔵自伝》。東京：平凡社。
- 石井寛治，1991。《日本經濟史（第 2 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石井寛治，1997。《日本の産業革命：日清・日露戦争から考える》。東京：朝日新聞社。
- 石森憲治，1909。《會計法精義》。東京：清水書店。
- 石塚裕道，1973。《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明治国家と殖産興業政策》。東京：吉川弘文館。
- 石田千尋，2004。《日蘭貿易の史的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千住製絨所（編），1928。《千住製絨所五十年略史》。東京：千住製絨所。
- 総合研究開発機構（NIRA）、戦後經濟政策資料研究会（浅井良夫編），1996-97。《經濟安定本部総裁官房調査課内外調査資料》。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村上勝彦，2000。〈貿易の拡大と資本の輸出入〉收於石井寛治、原朗、武田晴人（編）《産業革命期（日本經濟史 2）》頁 1-59。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村田誠治，1898。《神戸開港三十年史》（下）。神戸：開港三十年紀念會。

- 大石嘉一郎，2005。《日本資本主義百年の歩み：安政の開国から戦後改革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大島清、加藤俊彦、大内力（編），1974。《殖産興業（人物・日本資本主義 2）》。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大島清，1952。《日本恐慌史論（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大藏省（編），1928。《關稅率沿革表解》。東京：ヘラルド社。
- 中原虎男，1927。《織物雜考》。東京：酒井雄文堂。
- 中川敬一郎，1967。〈日本の工業化過程における「組織化された企業者活動」〉，《経営史学》2 卷 3 號，頁 8-37。
- 中村尚美，1952。〈わが国牧羊事業の先驅者ジョーンズの事蹟〉《日本歴史》52 號，頁 14-18。
- 長岡新吉，1971。《明治恐慌史序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長沢康昭，1990。《三菱商事成立史の研究：総合商社の誕生》。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津下剛，1943。〈維新前後の羊毛業〉收於本庄榮治郎（編）《重要産業の回顧》頁 138-67。東京：龍吟社。
- 津下剛，1943。《近代日本農史研究》。東京：光書房。
- 母井義雄，1969。《日本産業・企業史概説》。東京：稅務經理協會。
- 辻節雄，2000。《関西系総合商社：総合商社化過程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
- 鶴友會編，1924。《大倉鶴彦翁》。東京：鶴友會。
- 天野雅敏，2001。〈明治期の貿易商社・兼松商店に関する一考察：羊毛取引を中心にして〉《國民經濟雜誌》183 卷 5 號，頁 17-29。
- 天野雅敏，2004。〈貿易商社兼松商店の經營と前田卯之助：明治期を中心にして〉《國民經濟雜誌》189 卷 1 號，頁 21-34。
- 天野雅敏，2004。〈明治後期の兼松商店の經營動向と日本商社の濠州進出〉《大阪大学經濟学》54 卷 3 號，頁 60-77。
- 天野雅敏，2006。〈明治期における日本商社の濠州進出〉《經濟志林》73 卷 4 號，頁 295-314。
- 天野雅敏，2007。〈明治 20 年代初めの兼松房次郎の濠州視察に関する一考察〉《國民經濟雜誌》195 卷 2 號，頁 33-42。
- 天野雅敏，2010。《戦前日豪貿易史の研究：兼松商店と三井物産を中心にして》。東京：勁草書房。
- 田村均，2004。《ファッションの社会經濟史：在来織物業の技術革新と流行市場》。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田村貞雄，1977。《殖産興業》。東京：教育社。
- 田中隆之，2017。《総合商社：その「強さ」と、日本企業の「次」を探る》。東京：祥伝社。
-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1922。《本邦重要事業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藤村聡，2008。〈戦前期兼松の豪州支店在勤者〉《国民經濟雜誌》197 卷 6 号，頁 65-83。
- 日本銀行統計局（編），1966。《明治以降本邦主要經濟統計》。東京：日本銀行統計局。
- 日本經營史研究所（編），1988。《日本郵船百年史資料》。東京：日本郵船。
- 日本史籍協會（編），1927-1929。《大久保利通文書》。東京：日本史籍協會。
- 日本郵船株式会社貨物課（編），1932。〈我社各航路ノ沿革〉。
- 日本羊毛紡績会（編），1987。《日本羊毛産業略史》。東京：日本羊毛紡績会。
-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896。〈千住製絨所要覽〉。
-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908。〈千住製絨所第二要覽〉。
-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925。〈千住製絨所沿革誌：創業-明治 22 年度〉。
- 日本駐墨爾本名譽領事，1892。〈日本駐墨爾本名譽領事致外務省函〉（11 月 1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25 卷，頁 464-66。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
- 入江寅次，1936。《邦人海外發展史（上）》。東京：海外邦人史料会。
- 農商務省工務局（編），1981。〈「千住製絨所沿革」（自創業 至明治 15 年 8 月）稿本〉《西南学院大学商学論集》28 卷 3 號，頁 67-142。
- 梅浦健吉，1935。《羊毛工業》。東京：日本評論社。
- 梅津和郎，1976。《日本商社史》。東京：実教出版。
- 畠山秀樹，1996。《住友財閥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同文館。
- 武知京三，1974。《近代中小企業構造の基礎的研究》。東京：雄山閣。
- 福島正夫，1988。《日本資本主義の發達と私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米川伸一，1983。〈総合商社形成の論理と実態：比較經營史からの一試論〉《一橋論叢》90 卷 3 號，頁 319-43。
- 無作者，1953。〈創業時代の日本毛織（上）〉《東洋經濟新報》2599 號（10 月 31 日）。
- 名古屋高等商業学校産業調査室（編），1937。《我国の羊毛工業貿易》。名古屋：名古屋高等商業学校。
- 木代修一，1938。《井上省三傳》。東京：井上省三記念事業委員會。

- 和田憲夫，1982。〈纖維史余滴 2-千住製絨所と井上省三〉《化纖月報》35 卷 9 號，頁 65-69。
- 澤野雅彦，1981。〈日本的パートナーシャフト経営形態の系譜について－利益「三ツ割」制度の経営学的一考察〉《富大経済論集》26 卷 3 號，頁 480-97。
- 籠谷直人，1990。〈1880 年代のアジアからの“衝撃”と日本の反応－中国人貿易商の動きに注目して〉《歴史学研究》608 號，頁 1-18。
- 横山源之助，1990。《明治富豪史》。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
- Barnard, Alan. 1958. *The Australian Wool Market 1840-1900*.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Johannes Hirschmeier、由井常彦，1977。《日本の経営発展》。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 Maeda, Kazutoshi. 1990.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in Pre-War Japan,” in Shin’ichi Yonekawa,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pp. 33-45.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Marriner, Sheila, and Francis E. Hyde. 1967. *The Senior 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 Management in Far Eastern Shipping Trad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Nakagawa, Keiichiro, and Henry Rosovsky. 1963. “The Case of the Dying Kimono: The Influence of Changing Fash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Woolen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s.1-2, pp. 59-80.
- Nish, Ian H. 1975. “Japan Reverses the Unequal Treaties: The Anglo-Japanese Commercial Treaty of 1894.”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3, No. 2, pp. 136-46.
- Onions, W. J. 1962. *Wool: An Introduction to Its Properties, Varieties, Us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E. Benn.
- Pinkstone, Brian, collaborated with David Meredith. 1992. *Global Connections: A History of Exports and the Australian econom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Purcell, W. R. 1981.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Trading Company Network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1, No. 2, pp. 114-32.
- Rose, Edward. 1919. *Die Wolle auf dem Weltmarkte*. Berlin: D. Reimer.
- Sissons, D. C. S. 1977. “Karayuki-san: Japanese Prostitutes in Australia 1887-1916 (1).” *Historical Studies*, No. 68, pp. 323-41.
- Sissons, D. C. S. 1977. “Karayuki-san: Japanese prostitutes in Australia 1887-1916 (2).” *Historical Studies*, No. 69, pp. 474-88.

- Smith, Thomas C. 1955. *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1868-188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tistical Register of New South Wales*.
- Statistical Register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 Trace, Keith. 1981. "The Role of Liner and Bulk shipping in the Carriage of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the Economics of Shipping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Exports*, pp. 3-65.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Tweedie, Sandra. 1994. *Trading Partners: Australia and Asia, 1790-1993*.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 Vichian Chakepaichayon, 1981。〈明治初期の会社企業（1）－81社の定款分析〉《大阪大学経済学》31卷1號，頁98-114。
- Vichian Chakepaichayon, 1982。〈明治初期の会社企業（2）－81社の定款分析〉《大阪大学経済学》32卷1號，頁66-87。
- Ville, Simon. 2005. "The Relo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Australian Wool."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1, pp. 73-95.
- Wilkins, Mira. 1986. "Japa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before 1914."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0, No. 2, pp. 199-231.
- Yamamura, Kozo. 1982.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in Japan: Their Origins and Growth," in Hugh Patrick, ed.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pp. 161-9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asuzawa, Mine. 1982. "Changes in Lifestyle in Japan: Pattern and Structure in Modern Consumption," in Henri Baudet, and Henk van der Meulen, eds. *Consumer Behaviou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odern Economy*, pp. 179-205. London: Croom Helm.

Japanese Wool Trade with Australia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Kanematsu Company

Chih-lu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Japan began to trade with the West at the tim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of 1868. For many years, academics have continued their research upo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owever, few took interest the Japanese trade with Australasi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Japanese trade with Australia, through the Kanematsu Company's operations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ok the opinion that wool was a military raw material, and thi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Japanese wool import. But the import was involved in politics. Meanwhile, the privileges of Japanese trade in China since 1896 affected the growth of Japanese wool business with Australia. Later on, Kanematsu began trading other primary products with Australia, as well as its business in China, following the limited profit of wool trade. However,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e rise of estate value and price-making strategie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of Kanematsu in its first twenty years.

Keywords: Japan, Australia, Sogo Sosha, wool trade, business history